

用合理的制度破解“对跪”尴尬

□ 单士兵

“你跪着，我也只能陪你跪着。”面对下跪央求不要扣留小车的占道经营摊贩，城管曹祥超无奈选择“对跪”。近日，武汉街头这戏剧性一幕，反映出城市公共管理的深层尴尬。（4月16日《人民日报》报道）

在中国传统中，下跪是一种符号，语意是乞求，姿态是示弱。在权利平等成为社会基本意识的年代，摊贩牺牲个体尊严来守住谋生路径，让人感受到屈膝之下难以承受的重量。

或许正是如此，城管队员也压力沉重，特别是在民意注视下时，因而选择“陪你跪着”。正如当地城管部门负责人所说，“如果当天摊贩下跪而城管队员没有下跪，照片传到网上，可能就是另外一个结局”。这个结局，可能是城管部门遭遇强大舆论压力，更可能是曹祥超自

己“无奈走人”。

城市游摊走贩遭遇的困境，屡有所闻。《清明上河图之城管来了》等网络图片，各种新闻勾画出的“猫鼠游戏”，都折射出他们在城市中逼仄的生存空间。然而，城管又何尝不是如此？崔英杰案、夏俊峰案中，被刺死的城管同样是应该尊重的生命。面对整顿市容市貌、道路秩序的要求，城管即便穿上制服，也往往既缺少执法的依据，又缺少工作手段。此次对跪，不过是颇为戏剧化地再次展现了城管的尴尬。更何况，很多城管同样来自弱势群体。

城管与摊贩的对跪说明：在一个权力必须尊重权利的时代，如果缺少充分人性化的制度，权力本身也会掉进被动的窘境。当双方都不愿意用尊严为不合理埋单时，这种权利与权力的冲撞很可能以悲剧收场。

在城市公共管理中，很多地方没有把流动

商贩纳入到真正的城市管理体系中，而是以临时化的管理思维，对待这个群体的生存与发展。在这样的行政理念下，城市管理的规则制度，往往难以表达出足够的制度善意。通过“禁摆区”来把小商贩赶出街区，却不能为小贩和市民提供合理服务，必然会遭遇抵制，从而陷入更大的公共管理困境，要么更多对抗，要么陷于尴尬。

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城管制度，其初衷是在国企改制、城镇化加速、下岗人员和流动人口增多的大背景下，更好地维护城市秩序。这样的设计，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。然而，这种带有一定应急性的“委托执法”模式，10多年来未能从源头上加以完善，反而逐渐固化下来，成为诸多矛盾的“下水道”。面对城市生活的大变局，社会管理者不能把“苦差事”都推给一线执法人员，更不能以一个群体的“污名化”

为代价换取表面的有序与繁荣，而应以更有效的顶层设计，从根本上化解城管困局。

城市之大，在于能海纳百川。如果能以更开放心态接纳流动人口，划定区域与时段对小摊贩进行疏导，变管理为服务，城管的执法压力肯定会大为减少。如果能加强监督，成立专门的监管中心，依法依规处理问题，小贩也能更多理解。而引导摊贩成立自治组织实现自我治理与约束，甚至引入社区、社会参与其中，也都是社会管理创新、制度创新的必要内容。

街头对跪的城管和小贩，都有“不得不如此”的理由。然而，社会管理者更应看到背后的冲突，加强制度创新，以更加充满善意、以人为本的制度，走出小贩被行政妖魔化、城管被公众妖魔化的双重窘境，让小贩不用下跪求生计，也让城管能够站着执法。

遏制“监狱腐败”应引入外部监督

因“冰毒交易”一事备受关注的铁岭监狱又现丑闻。据人民网的调查报道显示，这座监狱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内情：狱警可为犯人私带物品，还可帮忙打包饭菜；白酒装入矿泉水瓶贩入监狱，狱警、犯人成“倒爷”；监狱自开超市，家属感叹供犯人比供学生还贵……

尽管这些腐败事实当然还有待一一核实，但“监狱腐败”对于公众来说，实已算不上什么爆炸性新闻。腐败源于不受监督的权力，与发生的部门并无必然关联。监狱腐败只是转型中国林林总总的腐败中的一部分。“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靠监吃监”，监狱腐败和其他腐败表现形态不同，但本质相同。

监狱处于司法链条的最末端。对于犯人来说，它是改造重生之地；对于公众来说，它是实现公正之所。如果说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，监狱就是实现司法正义的最后一道工序——至少对那些被处监禁的被告是如此。如果监狱腐败了，那就代表着司法正义的功亏一篑。一个腐败的监狱，对于世道人心的影响当是巨大而久远的。

其实腐败也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发生了腐败而不自知，或明知有腐败而不及早查处。从报道中看，铁岭监狱的种种乱象，并不在一时。按一些犯人家属的说法，这个监狱的“好”已经“名声在外”，甚至有家属为将犯人分到铁岭监狱而不惜重金的例子。媒体更披露出这个监狱的“腐败史”：2012年，原副监狱长张会东因先后7次收受他人贿赂81万元，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。另一名副监狱长皮德才也因涉案获刑。

刑罚也没能阻止种种乱象，说明腐败的利益仍远超其风险。乱象丛生，在押人员家属都知晓的“潜规则”，要说主管不知道、监督者不知情，这恐怕令人难以置信。若明知而默许，就是共同腐败，利益均沾；若确实不知眼皮底下的腐败，那也是渎职，而且是严重的渎职。记者调查监狱黑幕并不困难，反腐败部门的深入反腐怎么就发现不了那些问题？

破解此局，关键就在于谁来监督。若坚持内部监督，那必然是“上级监督太远、同级监督太软、下级监督太险”。不引入体外监督，内部监督就容易产生腐败的合谋。

这方面，我国香港的经验值得借鉴，香港的监狱监督主体是多元的，包括香港的立法会、法院、惩教署、申诉专员、太平绅士、香港人权监察、香港善导会、香港戒毒会等，他们可以通过巡视、走访监狱、听取和受理被监禁人的申诉、帮助被监禁人等方式对监狱进行监督。监狱监督主体的多元化，能够保证各种监督主体对监狱进行全方位、多角度、多层次地监督，确保监狱的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依法进行，有利于保护被监禁人的合法权利。

建立更为开放的狱政监督体系，才能避免监狱反腐走过场，让隐秘于高墙背后的黑幕，从此无处藏身。据悉，对于人民网的曝光，辽宁省监狱管理局昨日上午回应称高度重视，局领导已经带队赶往铁岭监狱调查。愿铁岭监狱丑闻，能终结于对腐败的制度化问责，而不是单纯为了回应舆情的“紧急善后”。

（转自《新京报》）

职教歧视，其实是知识歧视

□ 戎国强

中国人民大学前校长、现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理事会会长纪宝成，在接受中青报专访时，对职业教育现状的焦虑和不满溢于言表：“关于职业技术教育，大家谈起来都认为很重要，现实生活中又离不开，打心眼里却瞧不上。”“现在几乎没有市委书记、市长与县委书记、县长的孩子上职业院校，就连说职教重要的人的孩子一般都没有上职业院校。”

纪宝成列举了多项有关职业技术教育的歧视性政策和规定。审视这一系列的政策、规定，可以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点：知识歧视。以纪宝成的描述，就是人为地设计出一整套制度来，把不同功能和种类的知识和技能，分出高低贵贱来。

无论中考、高考，成绩最低者读职业学校——这个排序，也是一个知识排序：职业院校所传授的知识、技能是最“低级”的知识和技能。由此发端，职教生在求职、就业过程中的一系列的低评价、低待遇、低地位，以及职业教育的低声望，就顺理成章地出现了。

记得亲戚家一个孩子学习成绩不好，对高

考信心不足，建议他考虑高职院校，孩子及其家人听见“职业院校”一词，其恐惧、拒绝的表情与心理，如同遇见瘟疫。纪宝成说“老百姓不认可、不愿意送孩子上职业院校”，是因为在一系列制度安排下，读职业院校，庶几成了“知识贱民”。

说职教歧视是知识歧视，那么，比职业技术教育更“高级”的本科乃至研究生教育不是很受重视吗？“知识歧视”的观点还站得住脚吗？一直以来被诟病的“高校行政化”的核心，或者说要害，就是在从事知识生产的高校里实行官本位，而不是知识本位；从科研课题到其他利益分配，教授要仰行政之鼻息。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“地位”，虽然高于职业教育，但还是要看权力的脸色——说到底，所谓“知识歧视”，其实是对运用知识和技能从事劳动的人的歧视。

一朋友多年从事职业教育和职业教育研究，他说，在德国，一个出色的职教毕业生，可以拿到相当于大学教授的工资；在一般人的心目中，一个官员与大学教授、技术人员之间，并无中国式的“高低”之分。专访中纪宝成把当下社会风气归结为“拥抱资本、疏远劳动、轻视劳动者”；如果加上“拥抱权力”，就比较全面了。

躲什么



□ 李杏/文 焦海洋/图

广西柳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领导办公楼层，8个房间牌子上一律只标“办公室”，来办事的群众不知该到哪里找人。住建局副局长解释为办公室还未完全调整好，而柳江县住建局纪检组组长表示，由于上访户多，此举是为了防不听劝的上访户找领导。（4月15日《新京报》）

当领导不光彩吗？为什么不正大光明挂上牌子？老百姓上门来找，遮遮掩掩是不行的。为了避开“麻烦”，

使个“障眼法”伪装起来，既要不得，又很可笑。

来访的群众多，说明工作中问题多，群众集中要求见领导，表明问题没有解决好，群众不满意。不想办法处理好问题，避而不见，问题只会越积越多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领导躲起来，若是真的“怕”老百姓，倒是一件好事。但实际上，大概不是怕没有为老百姓办好事，而是怕给自己添麻烦吧。

郎平回归重燃 女排复兴希望

□ 肖良志

4月15日，郎平的身影出现在竞聘现场，让人们看到昔日精神图腾的同时，也为日益惨淡的中国女排注入了一针强心剂。1981年以来的31年，除了陈忠和执教的8年之外，其余23年时间里，郎平距离中国女排多近，冠军就有多近。

最后时刻才决定赴竞聘现场，郎平必定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，也积聚了强大的信心和勇气。郎平又一次做出妇孺皆知的亮相，必然会担当起中国女排全部的重任，以及国人对世界杯和奥运会冠军的渴望。

所以，当郎平还没有陈述自己执教思路的时候，她自身强大的气场，就让此前中国女排所有的纷乱戛然而止。1981年至1998年，18年的时间里，中国女排的荣辱几乎系于郎平一人。最为辉煌的五连冠期间，她是决定球队胜负的主攻手；胡进执教期间的最好成绩是世锦赛亚军，也是凭借重新招回郎平获得；1995年至1998年，她受恩师袁伟民召唤，拯救女排于危难之时，凭借强大的号召力，带队分别获得世界杯第三、世锦赛亚军、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亚军。

这18年的时间里，只要有郎平在，中国女排就和世界冠军、奥运冠军很近。陈忠和的那8年，曾经一度让人们忘记郎平。最近5年，蔡斌、王宝泉、俞觉敏治下的败局，让人们呼唤郎平重新出山。因此，竞聘结果尚未宣布，国人心中早已把郎平当做了中国女排里约奥运周期的主教练，并把这个选择定性为对中国女排的拨乱反正。最近5年过于混沌的现状，已让女排伤痕累累，心灰意冷。

唯有郎平，能够重燃女排复兴的希望。因为，作为史上最伟大的选手，中国排坛对郎平不可能不服；作为执教经历丰富、技战术世界一流教练，中国排坛对郎平不可能不尊；作为掌握世界排球风向和潮流的多面手，中国排坛对郎平不可能不敬；作为一个全身伤病而又报国心切的女人，她独有的个人魅力，中国排坛对郎平不可能不亲。郎平往那儿一站，就是中国女排的主心骨。

当然，郎平果真上任，等待她的并非坦途。当世界排坛逐渐走上职业化发展之后，像女足一样吃老本的中国女排早已滞后，这需要郎平和女排一起经历更多痛苦的煎熬，然后重生。